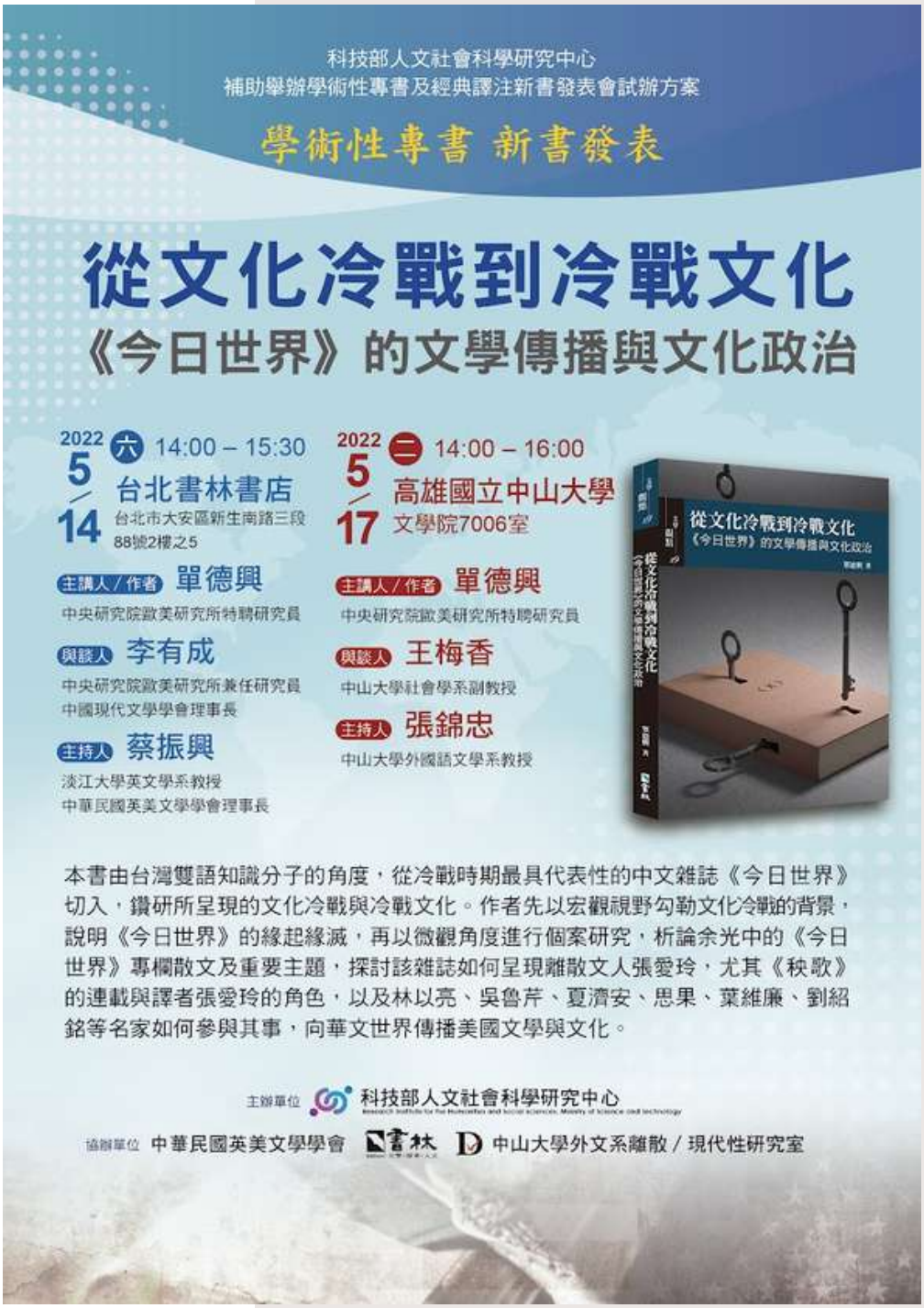
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新書發表會



前言

本會理事單德興老師新書《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10年第二期專書出版補助，今年五月由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書由臺灣雙語知識分子的角度切入，鑽研冷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中文雜誌《今日世界》，探討其所呈現的文化冷戰與冷戰文化，包括一些雙語知識分子、學者、作家如何參與其事，向華文世界傳播美國文學與文化。有鑑於此書的特殊性，並為促進學術交流，新書發表會由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協辦單位包括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書林書店、中山大學外文系離散 / 現代性研究室，五月十四日與十七日分別於臺北與高雄舉行，為因應COVID-19疫情，前一場採實體方式，後一場採線上直播。現場錄音由趙克文小姐謄打，送請發言者校訂，於學會電子報刊登，與會員分享。

臺北場

時間：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地點：臺北書林書店
主講人：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與談人：李有成（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理事長）
主持人：蔡振興（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教授、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

蔡振興：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大家好。歡迎蒞臨今天在書林書店所舉辦的新書發表會。在此，我們非常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性專書」新書發表。我們今天的講者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老師。與談人也是來自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李有成老師。在學界，單老師非常有名，原則上可以不用介紹，但在這裡我還是幫大家複習一下單老師的學術背景和成就。單老師是臺大外文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也曾獲得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學術獎等。單老師治學嚴謹，勤於筆耕，學術成就斐然，大家有目共睹。單老師從以前到現在，大約出版文學論著十五本、譯作十九本、訪談錄五本（含近作《王文興訪談集》），其他出版品包括散文集四本、中文編著九本、英文編著三本，總共出版五十五本書，而今天這本專書應當是單老師第五十六本書。綜合上述，單老師的學術表現，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也可作為我們的表率。對我來講，單老師一人分飾四角，好像《火影忍者》當中的鳴人，已經練就「影分身術」，他的四個身分就是：譯者、學者、訪者與編者。此外，單老師也是華文世界的雙語知識分子，而他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翻譯理論對學界的影響也非常深遠。親愛的嘉賓們，讓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今天的講者單老師。

單德興： 非常謝謝各位在疫情升溫時，還特別前來參加今天的新書發表會。我剛剛跟李有成老師說，沒想到現場有這麼多年輕的老師和同學，覺得很驚喜。《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經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推薦，通過科技部人社中心專書出版補助，在此謹表示由衷的謝意。也感謝李有成老師擔任與談人，我們兩人自一九七六年在臺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認識到現在，多年好友、同學、同事，一路彼此問學，包括這本書從構思到出版的整個過程。此外，要感謝蔡振興老師，不但以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的名義協辦這次新書發表會，也擔任臺北場的主持人。

今天很高興能在這個場合為大家介紹《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今日世界》這本雜誌內容非常龐雜，相關的研究並不多，基本上是以傳播學的角度，因為它是香港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出版的刊物。我自己因為是文學出身，所以聚焦於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

先談這本書的前世今生。女性主義常說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個人即政治」）。這本書和我其他論著相較，最大的不同是出發點帶有一些自傳的色彩，因此對我可說是 “The autobiographical is academic”（「自傳即學術」），試著在學術研究中帶入個人的成長與生命經驗。

我是四年級生，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到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解嚴，人生前三十多年成長於戒嚴體制下，也就是冷戰的年代。我出生、成長於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該地雖盛產水果，卻因九二一大地震而聞名。南投縣是臺灣唯一的內陸縣。記得從前有位縣長曾說，南投縣「四大皆空」，沒有機場、海港、高速公路，而原先通往臺中的鐵道自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沖毀之後就未重建。然而，即使地處「四大皆空」的南投縣的偏鄉中寮鄉，我在一九六〇年代都看得到《今日世界》，可見它的普及率與滲透力有多強。這是臺灣的情況。今天之所以邀請李有成老師與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來自馬來西亞，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談這個議題，套用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說法，也就是「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議題，看冷戰時期的美國如何透過文化滲透到華人地區。雖然那個年代已經久遠，那份雜誌絕大多數的細節也記不得了，但整體印象依然深刻。我記得最末頁有一欄「有獎象棋局測驗」，剩下幾個殘子，下期刊出解答。二〇〇四年我去香港進行訪談，承蒙鄭樹森教授介紹，認識今年一月剛過世的古蒼梧先生，他說他弟弟當初就是看了那個殘局棋譜，培養出深厚的興趣，後來成為象棋高手。由這個具體事例就可看出，一份雜誌對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影響，實在難以預料。

我大學和研究所是英美文學出身，看了一些英美文學作品，包括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譯叢，那不僅是當時品質最好的翻譯系列，甚至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為人津津樂道。我於一九八三年進入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為歐美研究所），這是中研院罕見的多學科與區域研究單位，有機會和不同學門的同仁一塊切磋。就中美文化交流而言，歷史學門的趙綺娜博士研究中美外交，尤其是從教育與學術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曾經到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等單位尋找資料，披沙揀金，她的論文為冷戰時期中美文化外交研究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許多不同學門的學者都引用她的見解。

我們外文學門出身的學者，在進入理論的年代之後，受到當代文學與文化理論的洗禮，尤其後殖民論述和文化研究等新興領域的啟迪，會用反思、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一些以往視為當然的事，包括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印象深刻、影響深遠的《今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然而身為文學研究者，基本訓練是研究作家與作品，而不是雜誌。若要進入這個不熟悉的領域，而且裡面涉及的範圍很廣，又跟自己的成長經驗牽牽扯扯，處理起來可說是難上加難。由於《今日世界》是由香港美新處編印，因此我一直期待有地利之便的香港學者能進行相關研究，像是香港美新處在冷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今日世界》和今日世界出版社在美國文學與文化傳播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就這樣等了好多年，但一直等不到符合個人期盼的研究成果，於是只好強迫自己進入這個領域，因為畢竟這些都與我個人的成長經驗有關。

一開始我並不敢做大，就集中於今日世界出版社。儘管如此，這個組織本身和出版品依然相當複雜，而相關文獻甚少，於是二〇〇四年我特地去香港，透過鄭樹森教授的寬廣人脈，當面或電話訪談了不少人，得到寶貴的一手資料。〈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刊登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號《中外文學》。其實我投稿時有點忐忑，因為學術論述的慣例是要「小題大作」，但那篇論文研究的是一個幾十年前出版了幾百種美國譯作的出版社，即使從文學翻譯的角度切入，範圍還是非常大，屬於「大題小作」的性質。然而，我自己知道那篇文章的價值，兩位審查人也提供了一些意見，我據以修訂和回應，得以刊登。

當時文化冷戰的相關研究不多，〈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是早期少數從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的角度切入，鑽研冷戰時期華文世界的文化生產與具體成果。沒想到當初這篇忐忑之作，竟成為我所有論文中最常為人引用的，而且引用者不限於文學或翻譯研究的領域，晚近還收錄於賴慈芸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主題論文集編纂計畫成果《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聯經，2019），成為跨領域的議題。

這可能跟我和李老師的學科訓練有關，因為我們都出身於比較文學，不會把自己侷限於狹隘的範圍。因此，對我而言，那是一個「大題」，先處理一個文化冷戰與翻譯研究的大框架，接下來的個案研究則是「小作」，相當於「廣播」之後的「深耕」。我接著做特定人物的「譯者論」，第一個就是張愛玲研究。那時她在大家印象中是作家，很少人研究「譯者張愛玲」，而她翻譯的最大宗就是跟今日世界出版社合作的成果。我那篇〈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除了分析她的譯作之外，並附錄助理協助整理的「張愛玲譯作一覽表」，把她的多種美國文類中譯（包括詩、散文、小說、文學史與文學評論）以及英文原作、自譯與英譯之作以表格呈現，讓讀者知道張愛玲文學志業的另一個面向。近年來有愈來愈多人從翻譯的角度研究張愛玲。

再來就是余光中老師的個案研究。我不是中文系或臺文所出身，不敢涉入余老師的詩歌和散文研究，選擇從翻譯的角度切入，因為翻譯是余老師的四大寫作空間之一，而余老師是我在政大西語系的翻譯啟蒙老師。〈在冷戰的年代 —— 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一文集中於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二年他與香港和臺灣的美新處合作出版的四本譯作——英譯的 *New Chinese Poetry*（1960）、中文合譯的《美國詩選》

（1961）、余光中原作與英文自譯的 *Acres of Barbed Wire*（1971）、中譯的《錄事巴托比》（1972）——以期呈現他對翻譯的投入，以及譯作的特色與多元性。

這兩篇論文都結合了文本與脈絡，針對兩位當代文學大師較為人忽略的翻譯面向，檢視他們在冷戰時期美新處贊助（patron）下的翻譯活動，以及個人如何出入於創作與翻譯之間，發揮主動性，而非只是接受委託、聽命於人的譯者。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這些一方面涉及冷戰時代盛行的意識形態，以及美新處的贊助，另一方面這個意識形態跟他們的政治立場相近，而且身為雙語知識分子，他們維持了自己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就長期的文學與文化傳播而言，這是對雙方最有利的方式。簡單地說，有關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國文學譯叢的論文，針對這個特定機構或建制（institution）進行廣泛研究，提供了寬闊的基礎，而後續有關張愛玲與余光中的兩篇論文則是深入的個案研究，由大襯小，由小顯大，彼此為用，互補互證。

接下來就該研究《今日世界》了。《今日世界》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三月，結束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前後二十八年，五百九十八期，內容包羅萬象，雅俗共賞——一言以蔽之就是「雜」。此刊原名《今日美國》，一九四九年十月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編印，免費發送，後來因為內容不限於美國，也報導世界其他地方，為求名實相副，一九五二年三月改名為《今日世界》，其實內容主要還是關於美國，有如 “We are the world.” 其實「美國就是世界」的心態至今未改。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日常使用的電子郵件，學術界的郵址後面是 edu.tw 或 edu.hk 等，但美國學術界的電郵 edu 之後並沒有 .usa。當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薩依德時，曾跟他提到這一點，他說自己沒注意到這個現象。

這份雜誌原為雙周刊，第五〇七期（一九七三年五月）起改為月刊，篇幅由三十六頁擴充為七十二頁，也就是每月的頁數維持不變，但出版的間距加倍，內容也有所調整，最明顯的就是增加了美國文學與翻譯的份量。此刊最盛時曾有一期印量高達十七萬五千份。後來美蘇對峙情勢趨緩，《今日世界》完成階段性任務，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停刊。此刊在結束時曾算了一下總帳，〈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提到，在二十八年間「總共印行了七千八百八十五萬一千五百零一本」，若首尾相連，「長度超過半個地球赤道——超過一萬二千哩。」

若說研究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叢就已相當複雜，那麼研究《今日世界》雜誌更複雜得多，以致我躊躇不定、裹足不前將近十五年。但隨著年事漸高，深知再不面對，恐怕時不我予，沒有心力、體力處理這麼大的議題，於是鼓起勇氣，奮力而為。為了逼自己奮進，我申請了科技部三年期計畫「美國的文明化任務及其轉化：《今日世界》於冷戰時期華文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因為我們往往會朝抵抗力小的方向走，如果沒有執行計畫的責任與壓力，手邊可以研究的東西還很多，很可能輪不到這個艱巨的計畫，慢慢地這輩子也就過去了。因此，《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既是自勉（自我勉勵 / 勉強）之作，也是一本知難而「進」的書。

本書的第一、二、三、四章原先都是不同場合的邀稿。我修訂、整合後，把書稿交給書林書店。書林考量到學術書籍銷路窄，推薦申請科技部人社中心的出版補助。按照該中心的規定，補助出版的專書要有緒論、結論，於是我打鐵趁熱、快馬加鞭，一個月內寫出了緒論與結論，大約有一萬七、八千字，使全書成為結構更為完整的專

論（monograph）。就整體架構而言，〈緒論〉之後是〈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接下來分章討論余光中老師在《今日世界》的專欄文章，《今日世界》所呈現的張愛玲，此刊如何傳播、推廣美國文學，以及〈結論：從今日世界看《今日世界》〉。總之，《今日世界》內容龐雜，除了新聞報導、時事分析、科學新知，像林太乙、南宮搏、徐訏等許多港臺作家都在此刊發表文藝創作，真要擴大研究會沒完沒了，不是我的能力與時間所能處理。因此冒著掛一漏萬之譏，我選擇從作者論以及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的角度切入，鑽研這份冷戰時期華文世界流通最廣、雅俗共賞的雜誌。

〈緒論〉從個人的成長經驗與學思歷程出發，以現身說法的方式，見證《今日世界》雜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作在冷戰時期的臺灣之普及度與滲透性；接著說明文化冷戰的起因，如何反思再現，並介紹全書概要。這份發行二十八年的雜誌以及同一旗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作，雖是一時一地的產品，但那些美國文學中譯即使今日來看價值還是很高。在座的梁孫傑老師是翻譯高手，很清楚我們受惠於這些美國文學翻譯程度之深。站在臺灣翻譯史或華文翻譯史的角度來看，那個翻譯系列的品質好，翻譯團隊的素質高，我曾形容這是支夢幻隊伍（Dream Team）。而美新處發行的《今日世界》印刷精美，售價低廉，內容多元，通路廣闊。為了遂行冷戰時期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它的目標讀者是華文世界的讀者，尤其是香港與「自由中國」臺灣的讀者，當時香港在英國治理下，中英雙語並行，相形之下此刊在臺灣的閱讀人口較多，影響較大。為了吸引港臺讀者，《今日世界》有不少關於港臺的報導，也常用港臺女明星做封面，比邵氏公司發行的《南國電影》還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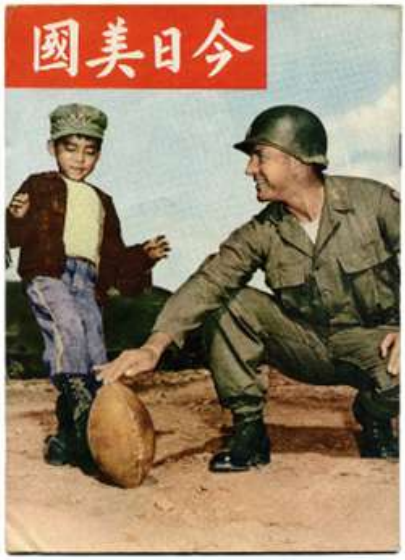
第一章〈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是應《攝影之聲》李威儀主編之邀，為「冷戰影像・美國因素」專號所撰。我曾從文化研究與視覺研究的角度，寫過幾篇有關攝影、電影與紀念碑的論文，很好奇自己的文章出現在以影像為訴求的刊物，在不同的脈絡下可能產生什麼新的連結與意義。

本章先說明此刊的緣起，並以「宏觀篇」指出《今日世界》的方針與特色。由於《攝影之聲》篇幅有限，只能寫五千字，出書時為了補宏觀角度之不足，增加了「微觀篇」，集中在一九六八年這個狂飆的年代，看《今日世界》如何呈現冷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年份。結果發現它所呈現的美國可說是和風細雨，甚至「粉飾太平」，即使那年大學校園裡有學生運動，黑人民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白人政治明星羅拔・甘迺迪（Robert Kennedy）相繼遭到暗殺，但只有一兩篇報導。相反地，對於蘇聯及其附庸中共、北越的報導則是連篇累牘，極盡批評之能事，對於盟友臺灣、香港與南越的報導則頗為正面，一片欣欣向榮、情勢大好。最後則提到該雜誌停刊的原因，以及作為當時華文世界流通最廣的雜誌之意義。

本章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美國選擇香港作為印行《今日世界》的地方？其實老美很精明，香港之所以中選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地理位置優越，既位於面對中國大陸的最前線，也方便連結臺灣與東南亞。第二，英國人的立場中立，不左傾或右傾。我在香港訪問一些資深學者、文化界人士時，他們都說只要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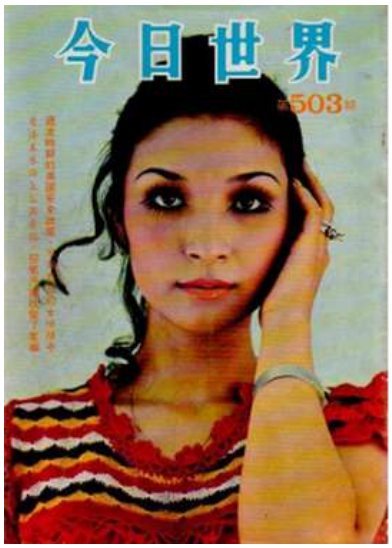
太過分，英國人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如果哪一方勢力過強，鬧得太過分，英國人就會把它壓下來。第三，當時臺灣處於戒嚴時期，中國大陸的思想箝制更是嚴酷，只有香港言論最自由開放，通行無阻。第四，當時香港匯集各路人才，包括逃避共產黨又不願意到臺灣的南來文人。第五，香港物質條件優越，包括印刷等。因此，鄭樹森教授稱香港為當時華人世界「唯一的公共空間」與「文化人的避難所」。

《今日世界》是圖文並茂的刊物，因此本書第一章附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圖片：像是《今日美國》第五十三期封面是美國大兵教韓國兒童踢足球 ；《今日世界》第一期封面是英國依利莎白女皇；由第一期首頁目錄來看，有將近二十篇文章，而且性質多元，不妨想想，五百九十八期會有多少篇？內容會有多雜？再看第一期的社論，標題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尤其下方編輯報告〈寫在前面〉，強調「黑暗與光明，奴役與自由，獨裁與民主，侵略與和平」的二元對立論調，令人印象深刻。



《今日世界》自第五〇七期由雙周刊轉型為月刊，改版首期封面為美國總統專機「七六年精神號」起飛畫面，似乎象徵尼克遜總統第二任期 / 《今日世界》改版後新階段的開始。改版後不僅篇幅加倍，內容也拓展，介紹更多的美國文學與文化，包括評介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書，或轉載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短篇譯作，既可增加內容，又可達到宣傳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成品之效。所增加的美國文學作品英漢對照，可進一步吸引有意學習英文與翻譯的人。

改版之前，《今日世界》為了吸引更多讀者，經常以港臺女明星為封面，如下圖左起是何莉莉、湯蘭花、陳莎莉。此刊開數大，彩色印刷精美，這種封面設計不論是擺在報攤、書店或圖書館的書架上，都是滿吸睛的（eye-catching）。五〇七期改版後，女明星封面明顯減少，不知對銷路有沒有影響？



隨著美蘇兩大集團關係轉變，冷戰對峙局面趨緩，最先砍掉的就是文化方面的預算，以致《今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先後結束，徒留下回憶。底下就是改版首期與最後一期的封面。《今日世界》前後二十八年，相當於一個人從誕生到將近而立之年，時間不可謂不短，影響也難以評估，值得深入探討。

第二章〈青青邊愁・鬱鬱文思：析論余光中的《今日世界》專欄散文〉集中於余老師。余老師在政大西語系當了兩年系主任之後，一九七四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挖角，於聯合書院中文系講授現當代文學和翻譯等課程。余老師初到香港時，左派百般拉攏，余老師不為所動，左派惱羞成怒，發起鋪天蓋地的攻擊，這就是余老師當時的處境。若對大環境有所了解，評論余老師時會更公允。余老師一向善於把握環境，開拓文學創作的領域，到香港不久便應邀在《今日世界》開闢散文專欄。熟稔余老師創作生涯的人都知道，他原先比較著重詩，聲稱用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為《左手的繆思》。後來逐漸詩文並重，轉捩點就是在香港。

余老師出書時，把《今日世界》的專欄散文打散，分別收入《青青邊愁》與《分水嶺上》，並進一步依不同性質分輯，因此除非翻看每篇文章後面所附的年代與出處，否則無法知道最初刊登的所在及先後順序。一般人研究余老師香港時期的文風與題材的轉變，根據的都是後來結集出版的書。我這章採取另類觀點，集中於余光中「香港時期」在《今日世界》發表的專欄文章，「從特定的建制性與脈絡化的角度」切入，既明瞭各篇出版的前後順序，也進行主題式的分類與討論。因此，余老師在香港的關門弟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樊善標教授表示，這是本文獨創之處。

由於專欄字數有限，而且面對廣大讀者群，希望雅俗共賞，余老師從前為了測試中文的密度、速度、張力的比較實驗性的詩化散文，並不適合這樣的情境，文風有所轉變。此外，他原先在臺灣時是在外文系 / 西語系教書，到香港則是在中文系教書，授課內容不同，這個機緣促使他重新評估五四與三十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對散文家的評論，可說是重寫文學史。記得我當時讀到他那些評論文章時，感覺就像老師批改學生的文章，完全顛覆了一般文學史上對白話文大家的尊崇。

關於這章，我有一處要更正，事涉到底是誰邀請余老師寫專欄？寫這篇論文時，余老師已經不在了，於是我請教余師母，當時她表示不太清楚。我就與張錦忠老師猜測，是不是林以亮（本名宋淇）或《今日世界》的編輯？但此刊並未列出編輯的姓名。宋以朗的《宋淇傳奇》第六章透露，「張同（筆名阿五），一直是〔《今日世界》的〕編輯」。而張同的《靜待好事》作者簡介也提到，他「曾任香港美國新聞處總編輯」。因此，本書第五十四到五十五頁的註十係根據這兩項資料。前兩天（五月十二日）師母打電話來，說看了這篇文章後她想起來了，是吳魯芹先生向美新處推薦余老師寫專欄。吳先生是余老師在臺大外文系的老師，專職為臺北美新處顧問，是華籍人士中職位最高的。余老師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的碩士論文是把臺灣的現代詩翻成英文，在吳先生支持下出版，即*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集錦》; Taipei and Hong Kong: Heritage Press, 1960）。先前我跟余老師訪談時，他提到當時的稿酬是臺幣一萬塊，非常優厚。前兩天我跟余師母提起，她說好像還不只。《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若有機會再版，這個腳註就要修訂。由此可見，若沒有書面資料或文獻檔案，就只能盡量多方詢問。這也是我多年從事訪談的重要原因：探尋並保存第一手的史料。

本章分門別類列舉這些專欄散文的特色與關懷：

（一）香港意識：因為余老師和家人身處香港，描寫斯土斯情乃理所當然、順理成章；

（二）臺灣情懷：移居香港的他回望臺灣，感懷深切，因為就是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身分由人子，而人夫、人父，由大學生，而少尉編譯官、大學教師、留學生、作家；那裡既是慈母過世、火化、埋葬之地，也是四個女兒呱呱落地之處；

（三）故國鄉愁：余老師作品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鄉愁，如今距離神州只是一水之隔，卻因政治理念不同，可望而不可即，只能透過筆端來抒發對故國的懷想 ；

（四）文化中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早已滲入余老師的血脈與深層意識，這些蘊藏心底、一觸即發的思念，因香港緊鄰中國大陸，各方訊息迅速流傳，更加強對文化故國的感受；

（五）反共立場：當時的共產中國壓迫平民百姓，侮辱文人作家，既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又仇視文化中國，破壞歷史中國，身處香港的余光中，知悉文革的悲慘景象，秉持一士諤諤、不平則鳴的精神，發而為文；

（六）中西對比：香港這個殖民社會既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與風俗習慣，又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最能凸顯中西風俗文化的特色，提供對比的例證；

（七）中文西化：余老師既為作家，又是翻譯家，珍惜中文之美，厭惡翻譯體 ，眼見中文西化的情況嚴重，不禁大聲疾呼，力挽狂瀾；

（八）文學評論：這類文章在專欄中較晚出現，但比例甚高，相對有系統，影響力相當可觀，更涉及五四以降白話文作家的文學史地位，這與他在中文系任教密切相關。

《今日世界》發行面廣，讀者群龐大多樣，這些專欄文章反映了作者的目標讀者與自我要求，並設法善用這個有力平臺，向廣大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發表文學創作，呈現文學見解與文化關懷，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

專欄第一篇是〈雲門大開〉，當時適逢雲門舞集首度到香港演出，余老師一方面介紹雲門給華文世界，尤其是香港讀者；另一方面，一如為其他作家寫序，不作應酬文章，在評論雲門舞集的演出與內容時，既呈現其特色，也指出可改進之處。專欄首次刊出時特附余老師的小像，作者簡介指出他是「聞名臺港的一位作家兼學者」，出版品的詩集、散文、評論、翻譯共有二十四種。其實，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港臺文壇關係密切。余老師的第一本詩集《鐘乳石》是在香港出版的，而王文興老師的第一篇小說〈守夜〉也是刊登於香港的《大學生活》（一九五八年四月）。

其他文章包括對於地方的書寫，如〈思台北，念台北〉、〈沙田山居〉。前兩天我還跟余師母提起，臺北的廈門街因為余老師的書寫而為人熟知；臺灣讀者讀過有關香港沙田的文章屈指可數，印象最深刻的當屬余老師的〈沙田七友記〉和〈沙田山居〉，他也編過《文學的沙田》（洪範，1981），可說是以一人一筆讓沙田聞名華文世界。

對語文的關切也是余老師撰文的重點，〈哀中文之式微〉就是代表作。為什麼現代人的中文不行？根據余老師觀察，「現代的教育制度」是一大原因，再加上翻譯體等因素影響所致。這可連接到余老師年輕時所寫的〈下五四的半旗！〉以及專欄文章中的〈論朱自清的散文〉。後者有兩個版本，《今日世界》版〈略論朱自清的散文〉分兩期刊出，因為專欄篇幅有限，只能「略論」，於是乃有《中外文學》版〈論朱自清的散文〉，是前者的兩三倍長，得以盡情發揮，後來收入《青青邊愁》的就是完整版。

第二章後有「附錄：余光中《今日世界》專欄散文」，把二十四期文章依時序用表格呈現，如期數與日期，標題與出處，收入哪個文集，版本有何差異等。這裡要說明一下全書引用資料的安排。《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為專書，原先考慮是不是像一般學術專書把引用資料集中在書末，可以節省篇幅，讀者也可一窺全部資料。幾經考量，決定還是維持在每篇論文之後，不僅因為各文獨立成篇，更重要的是，把相關的第一、二手資料集中在各篇之後，方便有心人按圖索驥。若是打散了放在書末，依所有作者筆劃順序排列，會與其他資料穿插，就失去這種效用。

第三章〈冷戰・離散・文人：《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指出，張愛玲一生到過香港三趟，最重要的是第二趟，離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待到一九五五年五月赴美。當時美國新聞總署取得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文版權，為求慎重，登報公開徵求譯者，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前往應徵。宋淇當時負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部門，原本在上海便知道張愛玲的文名，面談時印象深刻，決定由她翻譯。張愛玲從此建立起與香港美新處的合作關係，並與宋淇、鄺文美夫婦結為終身至交，甚至身後諸事也委託他們處理。

一般研究張愛玲根據的是出版社的單行本，但如果以historicize（歷史化）或contextualize（脈絡化）的研究方式，把她放回冷戰時期的香港歷史背景與文化脈絡，可能會看出不太一樣的張愛玲。當初我寫〈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時，著眼於一般人所不注意的譯者張愛玲，本章則著眼於作家張愛玲，卻是由《今日世界》的角度切入，因為這本雜誌除了連載她的反共小說《秧歌》，也刊登有關她的譯作和另一部反共小說《赤地之戀》的書評，甚至還有她在美國大學的活動報導。

《秧歌》先有英文版，再由張愛玲本人譯寫成中文於《今日世界》連載，連載結束當月立即由今日世界社印行單行本，之後才有臺灣的皇冠版，多年來一印再印，對張愛玲的作品有普及之功，但諸多版本有時也令人眼花撩亂。我的論文特地把她的連載版放在雜誌的文本脈絡以及相關的文化（/）政治脈絡。《秧歌》連載時並沒有作者簡介或編者前言，但連載前三期的社評，以及封面所搭配的新聞，卻具現了時代環境以及旗幟鮮明的反共立場，嚴詞批評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並對比追隨美國民主自由路線的臺灣。

從《今日世界》的脈絡來看，這篇連載小說難免讓一些中國大陸學者認為《秧歌》是反共的，因而損及它的藝術性。然而以小說的藝術標準來看，《秧歌》並沒有因為時代環境與反共氛圍而有損其藝術性，反而在對比之下更凸顯了小說藝術突破、超越了一時一地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框架。綜觀香港時期與之後的張愛玲，可說是以文字創作為家的離散文人，憑藉著對文學的堅持，持續不斷以中英文從事創作。

本章的兩篇附錄分別提供《秧歌》在《今日世界》連載十三篇的出處、內容與備註，也條列出《今日世界》所有關於張愛玲的評論。《秧歌》首次連載（第四十四期）時出現於封面標題，並與另一則新聞同列一行：「蔣經國訪美・秧歌 張愛玲」。第二回連載的封面是林黛，第三回是李麗華，都是當時大紅大紫的香港女星。最後一回連載的雜誌封底出現「秧歌 張愛玲著（今日世界叢書之九）」出版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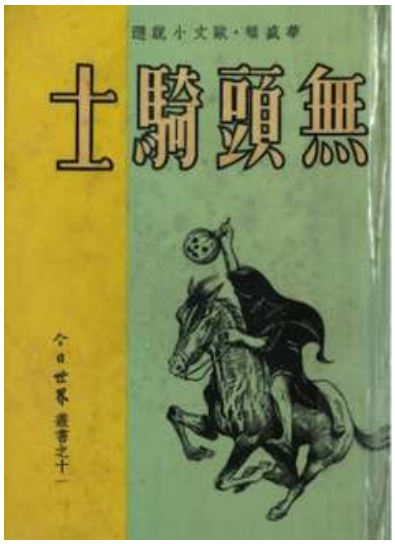
細看內文，《秧歌》第一期連載時，刊頭底下只有「張愛玲」三字，當中幾期補上插圖者姓名，「應如系圖」四字與「張愛玲」三字直式並排。「應如系」是化名，本名說法不一，我認為是張英超，並提供第一、二手證據，尤其是《今日世界》連載時插圖上的簽名，與陳子善教授的見解不同。最後一回連載末頁註明全文結束（「全完文」應為「全文完」之誤）。

因此，《秧歌》的出版史是先有《今日世界》的連載版，緊接著是今日世界社

的單行本，再來是一九五五年紐約的英文版。為方便起見，本章以表格呈現三個版本的異同，並在備註欄說明。從第121頁的表格可看出連載版與單行本的差異，有些是標點或錯別字的修正，有些則是實質的改動，以期更精準有力，這往往又涉及英文版。例如連載版第五十期第24頁：「然後金根在人叢後面站了起來，大家也就跟著劈劈拍拍一陣鼓掌」。仔細尋思的話，金根是在人叢後面，只是站起來，沒有發言，前面的人除非回頭，否則看不到他，遑論跟著鼓掌。單行本第八章第107頁補了幾個字：「然後金根在人叢後面站了起來，說，『我提議請王同志講話。』大家也就跟著劈劈拍拍一陣鼓掌。」以示大家聽到他的提議後鼓掌，使得現場情境與人物互動更合邏輯。

至於《今日世界》上有關張愛玲的評論，桑簡流的《赤地之戀》書評出現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六十五期，是該書最早的書評之一，雖只短短一頁，但頗有見地，提綱挈領指出幾個要點，直到今日許多探討仍不脫他所提的方向或重點。另一篇評論是王敬羲有關張愛玲翻譯的《鹿苑長春》（*The Yearling*），此書先前取名《小鹿》，由天風出版社出版，這家出版社也是由美新處在背後支持。最特別的一篇就是〈介紹《愛默森文選》〉，此書由張愛玲選譯自 *The Portable Emerson*。這篇表面上就是個書評，作者是「黎裕漢」。根據賴慈芸與張思婷的考證，「黎裕漢」是李如桐、余也魯、韓迪厚三人的「聯合筆名」（三人姓氏的諧音）。然而，進一步比對其他資料，赫然發現這篇「書評」其實是張愛玲本人為此書所寫的〈譯者序〉。像這些事情，若未追根究柢，覆查原始資料，就會遭到欺矇。因此，如胡適所言，「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多方查證，雖然辛苦，但可能就會是突破點。

香港美新處對張愛玲極盡禮遇之能事，這一方面顯示對在上海已享盛名的張愛玲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利於推展文學與文化宣傳。張愛玲翻譯過十九世紀經典作家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無頭騎士〉（“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此篇不但是歐文的名作，也很早譯成中文，流傳甚廣，因此獲得今日世界出版社的青睞，以不同包裝三度問世。一九五五年的《無頭騎士》收錄十篇譯作，其中張愛玲、方馨（鄺文美）、湯新楣各譯一篇、四篇、五篇，但書評列出的書目資料中譯者依序為張、方、湯，張譯為林以亮〈前言〉後的第一篇，書名也以張譯為名。此書於一九六二年易名為《歐文小說選》出版，封面註明「張愛玲等譯」。一九六七年，該社精選兩篇，把張譯篇名改為直譯的〈睡谷故事〉，與方馨譯的〈李伯大夢〉合為一冊，以英漢雙語對照方式出版《睡谷故事 / 李伯大夢》（*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Rip Van Winkle*）。這三個版本相隔十二年，問世時《今日世界》都搭配書評，可見對歐文的重視，以及對張愛玲的禮遇。像是先前林以亮編選的《美國詩選》，她只譯了五首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三首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詩，有些還是舊譯。全書譯詩最多的是余光中老師，撰寫詩人簡介最多的也是余老師，總共大約佔了全書一半。結果出版時，排名第一的是張愛玲，第二是林以亮，第三才是余老師。張愛玲曾說「出名要趁早」。由這些安排，一方面可見她當時名氣之大，另一方面是林以亮的支持以及美新處的禮遇。



張譯歐文小說以不同形式包裝發行（左圖由樊善標教授提供）。

《今日世界》有關張愛玲的最後一則訊息出現於第三五三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封底裡的「圖畫世界」，介紹「香港作家張愛玲最近應美國邁亞密大學之聘擔任教職（其職銜為Writer-in-Residence）」，並附了她與三位該校行政主管的合照。其實，張愛玲待在香港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年，就於一九五五年移居美國，一九六〇年入籍，以「香港作家」相稱顯然為了強調美國與香港、乃至亞洲的連結。張愛玲前往該校係出於劉紹銘的協助，不過從後來披露的張愛玲書信以及劉紹銘的文章可知，那段駐校作家的日子於賓主雙方的期待都有相當落差，以致張愛玲不久便離去。

本章之末的引用資料分別將張愛玲小說連載、相關書評與介紹等依年代順序排列，讓讀者對張愛玲早期的 reception history （接受史）一目瞭然。

第四章〈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中提到，《今日世界》力求通俗化與普遍化，並與今日世界出版社分進合擊。應邀撰稿與翻譯的幾乎都是香港與臺灣的代表性作家與學者，稿酬豐厚。葉珊（楊牧）第一份正式翻譯工作，就是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現代美國七大小說家》中的兩篇。他曾在文章中提到，翻譯這兩篇的稿酬抵得上整個暑假打工。

《今日世界》所刊的美國文學相關文字大致分為三類：（一）個人文章，以散文家吳魯芹與（吳之學生）學者、詩人葉維廉為代表 ；（二）書籍評介，由個別作家以書評（謙稱為「讀後」）與介紹的方式出現，評介的書籍幾乎完全出自今日世界出版社，以散文家、翻譯家思果與學者劉紹銘最具代表性 ；（三）譯作轉載，以漢譯或英漢對照刊登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作，此策略為出版者、譯者、讀者的「三贏」局面，最引人矚目的是與吳魯芹同為《文學雜誌》創辦人的夏濟安。這些人物不僅在當時華文文壇赫赫有名，而且吳魯芹與葉維廉都名列臺灣文學館編纂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其地位可想而知。

本章在討論他們的文章與譯作時，帶入創作脈絡、風格特色與文學地位，一方

面凸顯《今日世界》在當時港臺文壇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另類方式呈現翻譯在當時相對落後或封閉的華文文化多元系統（polysystem，又譯複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文提供了有別於一般研究的取徑，選擇從另一角度探討當時臺灣文壇熟悉的作家、學者與批評家，以加深我們對冷戰時代的文化現象與港臺文學交流的了解。

結論〈從今日世界看《今日世界》〉總結各章要旨，再次強調從這份雜誌的角度切入可見前人未見之處，也提示以史為鑑，指出國際強權的對立史不絕書。《今日世界》出現於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如今美中之間「鬥而不破」，被不少人形容為「新冷戰」或「冷戰 2.0」。若能更了解二十世紀的冷戰，包括文化冷戰及所產生的冷戰文化與後續效應，有助於看清目前國際局勢，至少可認識到所謂「芒果乾」（亡國感）不是現在才有，而資訊戰、心理戰、認知戰由來已久，或可研擬出更妥善的應對方式。

〈後記〉以比較個人的方式交代全書的緣起與寫作過程，以及一些內心的深切感受，基本上有兩個重點。一個就是說明《今日世界》雖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外交政策下的產物，但對當時的華文世界，尤其是戒嚴時期的臺灣，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啟蒙作用，也吸引了不少作家、學者與知識分子與之合作。然而這些作家是出於志同道合，善用這個有利的平臺，發揮個人所長，雙方互利共生。由余光中與張愛玲的個案可知，他們不受制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忠於個人的文學標準，努力發揮才華，不像當時風行的反共文學般惟政治立場是從。因此在《今日世界》上發表的作品，不僅在當時具有時代性，至今依然具有獨特的藝術性。也就是說，這些作品既回應了一時一地的情境，又蘊涵了穿越時空的力道。

另一個就是對當前學術建制的反思，針對國科會 / 科技部主導下的學術制度與論文審查，尤其是以特定期刊文獻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資料庫作為評量的依據，提出不同看法，並強調專書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期盼學者即使在這種大結構下，也能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不要屈從於一時盛行的學術體制與作業方式，而要「借力使力」，為彼此發揮最大的學術效益。

以上是對《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一書的簡要報告。再次感謝大家珍惜疫情下的一期一會，希望能藉此廣結文緣，緣緣相續。

蔡振興：單老師的演講生動活潑，簡報內容也提供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實屬難得。單老師的演講內容以冷戰文化 / 文化冷戰作為方法論，翔實地勾勒出從一九五二到一九八〇年間，有關《今日世界》如何與臺灣社會、學院以及文學與文化現象彼此連結、共構，彼此互為脈絡化的時代氛圍，並對張愛玲和余光中老師的文學創作重新加以詮釋與剖析。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話來說，單老師所處理的這些文化現象其實都表達某種「政治潛意識」。單老師的這些精彩的評論，從我的觀點來看，其實也和單老師自創的翻譯「雙重脈絡化」理論有關。整體來講，各位與會嘉賓應該和我一樣，在聆聽單老師的演講之後，每個人都是收穫滿滿。

我們今天的與談人也是一時之選，也就是坐在大家面前的李有成老師。李老師跟單老師一樣，兩人在學術上的表現皆為不凡，也都不需要多作介紹。李老師和

單老師是好朋友、好同事、好搭檔：單老師是一九八三年進入中研院工作；李老師比較早，從一九七七年念碩士時就進到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李老師曾在美國杜克大學、賓州大學、紐約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進行研究。李老師的專長主要是有關文學理論、文化研究，以及亞裔和非裔美國文學。我在臺大念博士班的時候，很榮幸能上過李老師的課，跟李老師學習非裔美國文學以及文化屬性和認同政治等專題。李老師很提攜後輩，我們這些後輩的學生都受到他的鼓勵和關懷，尤其是學術出版相關事宜。李老師除了學術著作外，其實也是詩人，共出版三本詩集：《鳥及其他》、《時間》和《迷路蝴蝶》。李老師偶爾還會在《自由時報》「放炮」，撰寫一些發人深省的詩。我覺得李老師詩寫得很好，有時語氣揶揄，又不失喜感。李老師的學經歷和著作很豐富，我從網路上印出來總共有十四頁，相當於一篇論文。因時間之故，我不方便多作介紹，現在讓我們一樣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李老師。

李有成：謝謝大家在疫情肆虐之下還這麼捧場，出席今天的新書發表會，很不容易。現在正在舉行《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一書的新書發表會，可是剛剛單德興老師還送給我一本由文訊雜誌社出版的《王文興訪談集》，一本新書還在舉行發表會，他又有新書出版了。單老師已經出版了五十幾本書，我曾經跟他開玩笑說，改天我要去他的研究室，讓他把書疊起來，然後站在書旁邊，我要證明「著作等身」真有其事。我想單老師給年輕朋友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即使是資深學者，要完成像《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這樣的一本書，充分的準備工夫是不可或缺的。我要特別推崇單老師在處理材料方面的功力，他有辦法把眾多斷爛朝報的材料挖掘出來，重新疏理，把整本書模塑成一個批判性敘事（critical narrative），有敘有議，以《今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為例，把我們帶回到冷戰——或者說文化冷戰——那個時空。

我準備了一些材料，剛剛聽單老師的報告後，我想我就不談原先準備的材料了。單師的報告勾起我很多記憶，我原來的題目是「文化冷戰的記憶」，其實也是我準備為七月一日「冷戰、馬華文學與文化」線上工作坊的主題演講題目。我以前常說，我們這一代，包括單老師，稱得上是冷戰的一代或冷戰的孩子，我們是在冷戰的氛圍裡成長的。我出生在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單老師是一九五五年，在座的書林蘇正隆董事長也是五〇年代出生的。五〇年代為什麼重要？那是因為朝鮮戰爭，或者在臺灣大家所謂的韓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前後打了三年，真正的冷戰是從韓戰結束後開始的。歐洲也許更早一點，譬如二戰結束之後，我們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之間的對抗。有冷戰當然也有熱戰。一九五〇到七〇年代之間還有熱戰，那就是越戰。

二戰後幾十年，世界重要的戰爭美國幾乎無役不與。美國在全世界有八、九百個軍事基地，這是《紐約時報》報導的；每年所花的軍費是天文數字。只要從軍費中拿出一小部分，就可以解決美國內部的貧窮問題，可是美國政府不幹。韓戰結束後美國開始從東北亞以迄東南亞建構一條防衛鏈，北起南韓，經日本（包括沖繩），到臺灣、菲律賓，一路下來，要把整個共產勢力圍堵在亞洲大陸。這是美國的圍堵政策。整個冷戰所具現的就是這個圍堵政策。甚至一九六三年英、美支持成

立馬來西亞，顯然也是圍堵政策的一部分，等於把那條防衛鏈延伸到南中國海。以前常聽某些人說，臺灣是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指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除了有形的，藉地理空間構築的圍堵，還有文化與思想方面的圍堵。這是單老師這本新書的主要關懷。他的研究對象是《今日世界》這本雜誌。單老師是在南投縣中寮鄉讀到這本雜誌，我也是七〇年代初在師大念書時讀到這本雜誌。很可能是雜誌社或美國新聞處贈送給系上的，系上又轉送給我們，因此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免費讀到這份雜誌。我還記得，有時候午後沒課，就坐在宿舍床邊，挨著書桌讀《今日世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說家南宮搏的專欄，有點像繪圖故事，多半是中國歷史故事。另一個就是單老師提到的徐訏，他是住在香港的小說家，也寫評論，曾以「鳥籠思想」這樣的概念批評極權國家對思想的箝制。

單老師也提到張愛玲。我讀中學時讀過不少五四時代的作家，不過那時並不知道張愛玲。一九六八年，我從檳城南下吉隆坡，到友聯出版社工作，主要參與兩份刊物的編務；最先是編《學生周報》，後來又加上《蕉風》月刊。友聯是香港所謂的第三勢力所成立的，他們既反對共產黨，也無法認同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只是他們對中國文化、對民主自由還有一點理想，於是就在香港辦起文化事業。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移居星馬，創辦了星馬的友聯出版社，出版《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當然星馬的友聯轄下還有其他文化事業，包括書店、印刷廠，以及教科書與參考書的出版等等。那時候我上班的編輯室旁邊有一間圖書室，有不少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我就是在那間圖書室借到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單老師在他的書中對張愛玲這兩本早年在香港出版的小說著墨甚多，特別是這兩本小說在文化冷戰下的意義，很值得參考。因為在友聯工作的關係，我也有機會讀到《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周刊》、《大學生活》、《新聞天地》等雜誌。

現在回頭看，單老師的新書所處理的其實是一個政治上非常嚴峻與肅殺的年代。美國透過《今日世界》這樣一份刊物進行其思想與文化上的統戰。「統戰」這個用詞在臺灣似乎負面的意義居多，其實就是政治上的統一戰線，想方設法要把跟己方對立的人統一過來，變成自己勢力的一部分，這只是一個將敵人納為己用的策略。對方要統戰你，你一樣可以統戰對方。美國就是這麼做的。美國透過雜誌、出版品進行思想與文化方面的統戰，不露痕跡，相當高明，日積月累，很多人就自然而然接受了美國的思想、文化與價值。最好的宣傳就要做得不像宣傳。

一九九〇年代初蘇聯及其東歐集團解體之後，華沙公約組織也隨之解散。不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依然存在，而且還不斷擴大，最近俄烏戰爭中就很明顯看到這個組織的身影。蘇聯及其東歐集團解體後，有人說冷戰就結束了。過去二、三十年，英語世界有關冷戰的著作不在少數。相對而言，這方面的中文書就絕無僅有了。單老師這本《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因此顯得特別重要。另外有一本《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二〇一二年出版，由日本學者貴志俊彥、土屋由香與臺灣學者林鴻亦共同編著（李啟彰等翻譯，稻鄉出版社），也值得參考。這本書很有意思，內容主要分析冷戰時期美國如何在香港、臺灣、韓國、寮國進行其文化與思想宣傳活動，有部分篇幅還談到電影與冷戰的關係。這算是一本比較全面討論冷戰在亞洲的著

作，只是很可惜沒有處理美國在星馬的角色。

二〇二一年時報文化出版林春美的《《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在某個意義上也與文化冷戰有關。林春美是馬來西亞的一位學者，對馬華文學很有研究。剛剛提到，我曾經參與《蕉風》的編輯工作。《蕉風》談不上是一份所謂右翼的刊物，只是相對於當時星馬比較封閉的所謂左翼文學而言，《蕉風》是非常開放的，包括發表了不少看來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還因此被某些人誤將《蕉風》歸為現代主義的刊物。林春美稱之為「非左翼」應該是比較接近的說法。《蕉風》也發表了不少寫實主義的作品，只是跟星馬文壇上所說的現實主義不同。這是一種黨派文學（partisan literature），有特定的政治立場，有時也被稱為新寫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種文學有一個公式：地主、老闆等一定是壞人；窮人一定是好人，經過了階級鬥爭，最後會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這一點非常羅曼蒂克，然而現實往往不一定是這樣。這種文學作品偶爾看幾本也許還覺得有些意思，但是千篇一律就淪為我上面說的黨派文學，這樣的模式少了創意，多讀就沒有意思了。現實人生顯然要複雜得多了。

剛剛出版的還有一本《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跟今天討論的議題比較關係密切。這本書由張錦忠、黃錦樹與李樹枝合編（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2）。三位編者中，張錦忠擔任過《蕉風》的編輯，因此對這份刊物相當了解。《蕉風》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建制，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雖然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在馬來西亞《蕉風》一直是某些現實主義者抨擊的對象，但是經過了幾十年，《蕉風》已經是馬華文學界的一個現象。如果沒有《蕉風》，馬華文學恐怕要失色不少，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最後我也不能免俗，要簡單地談談我處理過與冷戰有關的議題。我二〇一二年由允晨文化出版的《他者》一書的第二章〈冷戰與政治他者〉，研究一九五〇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獵巫行動。這無疑是文化冷戰在美國本土的著名事例。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是當時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是個右翼分子，極端反共。他和一些國會同僚成立了一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簡稱 HUAC），對好萊塢某些被他們視為左翼的電影工作者，包括製片人、導演、編劇及演員等，進行一連串有系統的迫害，有不少著名的電影從業人員因此失業，甚至被迫流離失所，亡命海外。《他者》這一章對麥卡錫主義的來龍去脈作了相當詳盡的分析，這是發生在美國本土的白色恐怖，跟當時的國際冷戰是分不開的。一九五〇與六〇年代發生在臺灣的白色恐怖其實也是冷戰的一環，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同時也是為美國所默許的。我另外有一篇論文〈在冷戰的陰影下：黃春明與王禎和〉，討論冷戰如何影響臺灣文學，刊登在《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二十六期（二〇一九年九月）。我以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與〈我愛瑪莉〉，以及王禎和的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析論冷戰時期美國思想與文化如何滲透進入臺灣一般民眾的生活。黃春明與王禎和大概不清楚冷戰對他們的影響，只是我們從他們的小說可以看出，他們針對美國文化與思想對於臺灣某些人的影響作了相當深刻的反省與批判。從這個角度看，黃春明與王禎和這些作品確實另有一番意義。

我講話的時間也到了，應該到這裡結束。我大概簡單地回顧自己與冷戰有關的一些經歷，主要還是想為大家推薦單老師這部《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謝謝大家。

現場問答

蔡振興：非常謝謝李老師簡潔扼要的回應及補充相關的想法。接著進行現場提問。

梁孫傑：很感謝單老師與李老師分享冷戰的回憶與經驗。我很佩服單老師這本書，將那麼龐雜的細活呈現出來，知難但還是照做，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單老師說的冷戰時期的這些文人所表現對於學術及人文的堅持、風骨以及治學態度，對我個人是滿大的啟發。我想請問的是，翻譯在冷戰時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有很重大的影響。就您來講，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翻譯在現代的文化時空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單德興：謝謝梁老師提問。梁老師現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本身也是很傑出的翻譯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Finnegans Wake*艱深難解，可說是「有字天書」，梁老師知難而「進」，於二〇一七年翻譯出《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A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Finnegans Wake*），也是由書林書店出版。書林書店除了銷售原文書，也出版了國內許多外文學者的著作與翻譯，在臺灣的外文學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說不定多少年後書林書店也會像今日世界出版社一樣變成值得研究的對象。而我們之所以會投入譯介文學作品，可能多少都與當年閱讀翻譯的經典文學作品有關。

這個問題真是大哉問。我在研究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系列時，就文學類別列出翻譯的作品與譯者的名單，發現翻譯的作品都是美國經典文學或具代表性的現當代文學，至於那些中譯者則有如「夢幻隊伍」。美國文學沒有英國文學源遠流長，為了向外推廣，必須借重翻譯。至於香港，因為在英國治理下，認為英文好是應該的事，因此一般說來沒有那麼注重翻譯，以致讓美國人有機可趁。這裡要岔出去一句話，臺灣目前在推動雙語國家政策，其實就是英語化，但歷史、文化、語言條件與香港、新加坡很不一樣，一定要非常審慎，要保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利基與主體性，千萬不要捨本逐末，得不償失。

以當時臺灣的情況而言，翻譯確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啟蒙角色，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許多文學譯作更是令人驚艷，成為華文翻譯史的重要資產，我們這一代更是深受其益。從前資源少，就集中於少數比較有規模的出版社，現在則因為教育普遍與資源普及，甚至一人出版社只要找到好書和好譯者，照樣可以翻譯出版，因此比以往更多元。再加上當今訊息管道非常多，網上資源也很多，但翻譯依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啟蒙或引介新知的角色，這從臺灣每年出版翻譯書比例之高就可看出，包括書林本身出版的一些翻譯。

還有便是除了狹義的翻譯，也就是文本的翻譯之外，也該放眼於廣義的翻譯，

遍提升中文讀者對外在世界的認識。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年我比較會答應撰寫書序、書評的原因，希望協助推廣良好的書籍與翻譯。我們身為學者、雙語知識人，尤其是外文學者，要善用自己的專長，不只把翻譯放在原文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也放在臺灣或華文的文化脈絡，這就是剛剛蔡老師提到我主張的「雙重脈絡化」。像是最近我為臺裔美國作家游朝凱（Charles Yu）的長篇小說《內景唐人街》（*Interior Chinatown*）撰寫導讀，一方面因為臺美文學是剛萌芽的領域，而這本書是第一本得到美國全國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臺美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因為這部長篇小說以劇本的方式呈現，也有不少與亞美 / 華美歷史與文學相關之處，一般讀者恐怕難以進入，於是我就在作者與華文讀者之間當個傳譯者，建立起溝通的橋樑，這也是廣義的翻譯。總之，翻譯除了文本的迻譯，還涉及文化的轉譯，希望盡量兼顧文本與文化的意義，強化翻譯的效應，有利於落地生根，建立有華文世界、甚至臺灣特色的文學與文化翻譯。

蘇正隆：我自己當年對翻譯的觀念與認知，就受到今日世界出版社的那些叢書的影響，譬如夏濟安那兩冊《名家散文選讀》，譯文就像明清的小品文，我從裡面得到很多的啟發，跟市面上的新潮文庫形成強烈的對比。林以亮、喬志高那些譯者都是一時之選，很好的模仿對象，產生了很正面的影響。

李有成：剛才正隆兄提到翻譯。我想起大概十七歲左右，我還在檳城鍾靈中學讀書，就買到林以亮編的《美國詩選》。我中學時候讀過一些英國詩，真正第一次讀到美國詩還是這本翻譯的《美國詩選》，為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實在受惠甚多。就因為讀了那些譯詩，我後來還到檳城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借了一些美國詩集來讀，所以這個機緣也十分難得。

游常山：我小單老師八歲，就讀成功高中時，青島東路有一家星島日報社，是香港直營的，我都在那邊用自己的錢去買《今日世界》雜誌和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書，像是張愛玲、湯新楣翻譯的小說。美國從二戰以來到現在能夠掌握文化霸權八十年左右，這種文化霸權和戰略有關係，而這樣的文化影響力，就像單老師提的雙重脈絡，不只來自文本翻譯，還來自更大的文化翻譯。回到我個人的閱讀經驗，重看張愛玲、林以亮的譯作，發現都是很棒的文本，包括夏濟安翻譯霍桑的〈古屋雜憶〉，從沒看過那麼好、那麼漂亮的散文。隔了快五十年了，到現在還記得。這算是我的感想。

蔡振興：非常謝謝主講人單老師、與談人李老師，以及各位熱心參與，今天的新書發表會就到這裡圓滿結束。

（左起）主講人單德興、與談人李有成、主持人蔡振興。

主講人單德興。

與談人李有成。

（前）蘇正隆發言，（左）梁孫傑。

高雄場

時間：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主講人：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與談人：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張錦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張錦忠：歡迎大家參加單德興老師的線上新書發表會。《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書。單老師說他很緊張，因為很少線上演講；我也很緊張，因為從來沒有主持過這麼多人的會議。

單德興老師是不太需要介紹的，因為他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學者。舉凡講到英美文學、比較文學都會想到他。談到翻譯、美國文學、華美文學、薩依德、《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冷戰、訪談、學院建制、知識分子論、余光中研究、王文興研究等等，沒有一個領域不跟他有關係。他很厲害的是，每個領域都有成果發表。這些成果不只是論文，而且出版成書。我們常講著作等身，單德興老師正是如此。此外，他獲獎無數，國科會研究傑出獎得了三次，教育部學術獎也得了。今天能夠主持像單德興老師這樣研究表現傑出、學問知識淵博的同行的新書發表會，當然是我的榮幸。

這本書的背景是冷戰時期。某個年齡層的人總是說他們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其實我們都是「冷戰世代」，這個說法可能比「嬰兒潮」來得貼切。冷戰其實是世界強權意識形態的對峙，兩軍不上戰場交戰的話，就打間諜戰、文化戰、太空戰、經濟戰、宣傳戰、思想戰等等，用來爭取人心。思想戰的戰場在文化場域，在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各個管道。《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這本書所研究的《今日世界》，就是傳播美國文化非常有名的「大外宣」刊物。

今天除了發布單老師這本書之外，也希望他能談談冷戰文化研究的議題。單老

師這本書涉及兩個研究面向。第一個就是冷戰的研究：研究這麼大的議題該怎麼切入；第二個是小問題，就是我們通常研究作家作品文本，而不是關注一個刊物。像《今日世界》這樣的一本雜誌要怎麼研究。接下來就請單德興老師來談談寫這本書的甘苦。

（單德興報告內容，請參閱臺北場。）

張錦忠：近年來國內學界頗多冷戰研究。王梅香老師的主要關注在冷戰時代的文藝體制。這幾年她研究友聯社、《蕉風》、《學生周報》、美新處等，就冷戰文化的脈絡寫了好幾篇文章，特別是關於友聯部分，成果相當亮麗。當然李有成老師跟我對友聯及星馬文藝的場域很熟。梅香因為做友聯的關係，跟當年學友會的某些成員常有聯繫。今天由她來談這本跟冷戰有關的書，我想是不二人選，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請她參與，可惜疫情關係，只能透過視訊討論。

王梅香：謝謝錦忠老師，謝謝德興老師，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我今天會針對自己讀過單老師這本書，來分享閱讀之後的啟發，還有一些討論。因為單老師和我平常不只討論學術上的事情，也會有一些人生或宗教的分享，所以對我來講是經師也是人師。我覺得最好的回應，就是好好讀老師的書，再來講一下自己的想法和看到的東西。

我讀完老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個想法就是重新反思，從以前到現在所學習的這一切，到底是不是我們所視為的「理所當然」？是什麼構成我們今天的想像和認知？其實它可能是一個很長期的建構過程。就像單老師剛剛講到，這本書其實涉及個人的經驗，但也是政治的，甚至是國際政治與個別行動者之間互動的過程。我自己在做美援相關議題時，從受訪者身上看到類似的感受。他們其實覺得只是自己個別的生命經驗，而且自己「人微言輕」，可能不覺得他們的記憶扣連到更大的冷戰的背景。線上應該有一些研究生，我覺得德興老師這本書滿適合正在寫論文的同學。

這本書一開始的切入點是從個人的生命經驗，然後扣連到想要談論的公共議題，或是一個更大的學術命題。這本書涉及五、六〇年代都會聽到的一個順口溜，就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看看看，看《今日世界》」。除了老師剛剛講到在南投中寮的經驗，我也分享一些我曾經對話過的，或是老師跟我說的經驗。像周婉窈老師說她在嘉義大林也看到《今日世界》出現在那個時候的書報攤上，因為是彩色封面，確實非常吸引人。或是臺灣的客家作家鍾鐵民老師跟我分享說，他在高雄美濃念小學時，學校會廣播，今天可以去拿《今日世界》。大家可以想想，那個時候大林、美濃的交通比較不方便，可是都可以取得這些刊物，可知這刊物在臺灣普遍接受的情況。

第四個例子來自電影。我本來想截取一段影片，但是擔心有版權問題，所以就用講的。吳念真拍攝過一部電影《太平天國》，可能沒有像《多桑》那麼紅，裡面有提到《今日世界》。 滿有趣的是，裡面透過知識分子林正盛所扮演的角色，他拿

著一本《今日世界》，安慰他斷指的弟弟說：你知道這一期的《今日世界》在講什麼嗎？現在美國有一種顯微手術，把兔子的耳朵割下來，在顯微鏡下再把兔子的耳朵縫回去，之後這兔子耳朵還叮叮咚咚，非常的靈活。結尾那一句，讓觀眾印象深刻：「老美實在有夠厲害！」這影片在 YouTube 上就有，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從單德興、周婉窈、鍾鐵民、吳念真這些人，不管是口頭的或是透過影像的，或是傅月庵講《今日世界》是「港臺雜誌界的龍頭老大」，其實不只在港臺，在整個東南亞都有銷售，影響範圍可能是所有美援刊物中最大的，構成了一個世代的共同記憶。我覺得德興老師讓做研究的人可以思考怎麼從成長過程經驗中，看起來很瑣碎零碎的記憶，卻可能發展出很重要的命題。

接下來談我會怎麼去看這一本書。我試著分成幾個不同的視角來談。每次講到這裡，都會覺得自己又開始在上課。我在系上有開一門課叫「閱讀與寫作」，這門課有一個月會作書評（book review）。我會跟學生講，書評要分成幾個部分。第一部分德興老師剛剛已經做了非常完整的介紹，就是整本書的摘寫；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可能就是對這本書可以有哪些視角去定位它，或是肯定它的一些貢獻。我會從以下五個視角去思考這一本書，從小到大。

第一個視角是作者個人學思歷程，也就是從德興老師整個學思養成過程，還有著作談起。從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的背景，本來是學習美國文學，現在站在比較批判或反思的角度去解剖自己過去所學，重新去反芻。我覺得它是一個去解自己身世之謎的作品。也許大凡很多偉大的著作，其實都是在解一個謎（puzzle），那個謎可能是與自己切身經驗相關，這是同學們可以學習的。

再來就是大家可以從網路上看到老師的著作很多，像剛剛錦忠老師講的，從美國文學還有翻譯薩依德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學生時代要讀的，不能不說我們都是看老師的書長大的。從翻譯薩依德的著作，甚至還有佛學相關文集，到文化冷戰的研究，從這樣去定位他的整個研究思路和發展。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可以從作者個人的學思歷程去定位這本書。

第二個視角是從《今日世界》這個刊物的研究去看這本書。《今日世界》是一本綜合性雜誌，我個人覺得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可是如果你現在上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去搜尋，會發現只有四篇學位論文討論《今日世界》，其中一篇還是比較早期的。我說的是以《今日世界》來作為主體的研究，不包括在論文的某一部分談到《今日世界》。第一篇〈傳播媒介塑造映象之實例研究——「今日世界」塑造中國人對美國人良好映象之方法〉比較偏向傳播學，用新聞意象（image）概念，去解釋美國怎麼透過《今日世界》去進行印象的塑造，傳達給這些受眾。第二篇〈冷戰現代性的國族 / 性別政治：《今日世界》分析〉比較著重在國族與性別。第三篇〈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與美國形象的塑造：美國新聞總署及《今日世界》的發行〉從美國新聞總署文化外交的角度，去談形象塑造這個部分。第四篇〈今日世界出版社對50-80年代臺灣人社出版的影響〉是對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研究。由此可知既有的《今日世界》研究還是很少，對它的了解還是遠遠不夠。

從德興老師這本書，可以看到他在研究方法上，做到我們都沒有做到的。他去

訪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相關人員，這是對於今日世界出版社研究很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如果我們把這本書放在整個《今日世界》來看，除了針對裡面的專欄、美國文學翻譯的部分，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角度去切入這本雜誌？其實還有很多，比如性別部分，很多女作家在上面發表；歷史小說家，像是高陽、南宮搏，也在上面發表；另外包括教育、科技、科學，甚至給兒童的作品，因此還有很多的面向值得研究。

德興老師說《今日世界》很「雜」，但是「雜」的另外一個意涵就是很豐富，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我覺得它仍是一個有潛力的研究議題，很有發展性。而且《今日世界》的取得不是太困難，某些圖書館有比較集中的館藏，比較錯落的或不見的期數，可能可以在其他圖書館找到，我想對它的研究不會太困難。

我的第三個視角會放在雜誌研究，就是去看這本書怎樣去研究雜誌。如果線上有文學研究者或文化研究者，這也是滿重要的一個啟發。這本書所討論的是內容很龐雜的雜誌，老師很謙虛的說是內容廣泛的「大作」，有趣的是在「大作」中有「小題」，在「小題」裡又可以看到「大作」。我下面談這本書的第二、三、四章的閱讀感想，有很多可以進一步討論或延伸。

以前我翻過《今日世界》，有很多作家在上面連載。第二章把余光中的專欄散文全部整理出來，主要是集中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八年，我自己過去的研究比較集中在五〇和六〇年代，所以對七〇年代之後就沒那麼注意。這次看到《今日世界》余光中的文學專欄，我會進一步思考，大家怎麼去思考這本綜合性雜誌——《今日世界》是給一般大眾看的。在這刊物上出現的余光中散文，我們可以怎樣去定位？從這裡可再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從余光中與香港文壇的互動談起，第二層是其實那時候臺灣與香港文學的場域關係是很密切的，雙方的互動交流史是很有趣的。

可以補充一下，我們如何研究《今日世界》這樣的美援刊物，在香港被稱為「綠背文化」（綠背即美元）。有人可能會想，這樣的刊物就是綜合性刊物，那我做文學研究，到底能夠對我有什麼啟發？其他刊物，像《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周刊》、《大學生活》都由香港友聯出版，當然也有美援的背景。我去分析這些刊物上個別作家的發表，到底能夠協助我們看到什麼？或是能夠幫著我們看到這些作家平常作品之外看不到的什麼東西？

對於余光中與香港之間的互動，有一個比較主流論述就是開始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余老師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國學生周報》第一七三期第七版登載的《祖國周刊》目錄上有篇詩作〈咪咪的眼睛〉，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國學生周報》也有篇詩作〈冬之木刻〉。其實我們只要在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s://hklit.lib.cuhk.edu.hk/）輸入「余光中」，就會跑出這些五〇年代的作品。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除了研究作家、看他的單行本和著作之外，如果帶入雜誌的觀點，你會思考：為什麼會在這份雜誌上發表？發表的是哪一些作品？五〇年代香港已經有讀者在看余光中了，而且《中國學生周報》是給中學生與大學生看的，針對學生族群，與《今日世界》有點不一樣。我相信對學生的創作啟發會更多。因此，從雜誌研究可以知道這個作家其他的層面。

剛剛講到主流論述認為，余光中與香港文壇的互動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他的

詩集《鐘乳石》（1960）是由香港的中外畫報社出版。《中外畫報》是有背景的，是一九五六年一個國民黨政治人物〔鄭彥棻〕的祕書〔蘇錫文〕去香港創辦的，因此可以去探討畫報的背景。所以我們如果從雜誌的角度去探討這個作家，也許可以幫我們揭示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再來就是張愛玲的部分，這屬於單老師書裡的個案研究。老師從連載版到單行本到英文版，做了很詳細的比對，看到滿明顯的現象就是有某些更動，這些是作家自己修改，還是編輯幫她修改？這我不是非常確定。這個更動本身，感覺比較不是在意識形態，主要是在文句上面，讓它更生動地表達作家想要表達的意思。這樣的連載版與單行本，甚至張愛玲之後還有不同語言的翻譯，可以看到整個出版的過程。我記得她的小說還改編成廣播劇，在不同的媒介之間不斷地轉換。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轉換，怎麼先連載再出單行本，其實單行本裡的內容也可以拿來連載，我覺得整個過程放在雜誌研究裡面來討論，會滿有趣的。

另一個是譯者張愛玲的部分，讓我印象很深刻。很有趣的是，單老師分析下來，聽到的是她的翻譯很好，但數量沒有很多。也許她的象徵資本是更重要的，也就是在整個譯作裡面的代表性。

第四章美國文學的部分，我知道《今日世界》至少在五〇年代一直有缺稿的問題，連載稿件不夠時就會寫信給《文藝創作》〔1950-1956，發行人張道藩〕，想像一下你是編輯，必須兩個禮拜就出刊，要確保每一期在文學的部分都能夠有東西。如果有個譯作可以連載，而且譯作又是我們自己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從整個雜誌的編輯與運作，去思考這些連載或是單行本或不同的轉譯。單老師在第四章談到，美國作家的作品譯作轉載的比例很高。甚至我自己稍微研究《中國學生周報》與《蕉風》上面也有很多這種轉載，有的是先在臺灣發表，再去香港轉一次，轉完再轉去星馬。在東南亞這些不同國家的文學場域，有些作家好像在旅行，在這個冷戰時代，他們透過美援的刊物在不同的國家遊走。我覺得叢書與雜誌之間轉換的關係，可以再深入探討。

在第四章有個部分我自己比較想談的就是劉紹銘，他翻譯的猶太人作家其實是自己選擇的。這會扣連到後面，我想從行動者的部分再去談。大家也可以思考，這一點滿重要，我們把美新處的譯書有沒有想得太鐵板一塊；或是像德興老師強調的，我們應該去看個別的行動者，像劉紹銘的情況就很不一樣。可是有些作家翻譯的時候，是從既有的定本作選擇。余光中在翻譯《美國詩選》時，有些詩就是翻不出來，可以替換，但不是無邊際地去搜尋所有的美國詩，而是有底本的，在底本裡再去選擇。即便在陳建忠所說的美援文藝體制底下，其實個別的行動者在不同的書、不同的選集、不同的計畫裡，情況是超過我們想像的複雜。包括我自己用美援文藝體制來談，可能產生的侷限是什麼？

第四個視角是把《今日世界》放到整個美援文化或香港學者所說的綠背文化的刊物去看的話，我覺得更能夠去定位它，尤其它作為一個綜合性刊物，在這些刊物裡面的定位是什麼？它有一個姊妹品叫《四海》，但是很少人去研究，因為《四海》是畫報，只有五年多的壽命〔1951-1956〕。我們可以問，同樣是美新處出版的大眾刊物，而且是給整個東南亞海外華人看的刊物，為什麼《今日世界》可以從

一九五二年出刊到一九八〇年？為什麼《四海》一九五六年就結束？這是另一個可以延伸的議題。我們可以把《今日世界》放在整個美援文化去定位，會發現它的對象是一般大眾，特色是綜合性，相對於《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周刊》、《大學生活》那些香港的友聯出版的一些刊物，在星馬則是《學生周報》、《蕉風》。因此，另一個定位《今日世界》或定位這本書的方式，就是放在美援文化的研究裡面，會發現相對於《蕉風》或者《中國學生周報》的研究，其實《今日世界》的研究是比較少的。

第五個視角是從近幾年的文化冷戰研究，也許我們已經知道美國新聞總署做了什麼，知道美新處做了什麼。近幾年的文化冷戰研究有一個趨勢是轉向中介者（intermediary）的研究。我們看到美國在整個東南亞從事文化宣傳的時候，權力不是直接下來，而是透過很多的中介者，那他們是誰？比如說自由亞洲協會（一九五四年改名叫亞洲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我們所謂的 NGO（非政府組織）。我覺得中介者的角色是值得思考的。《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這本書討論到結構面，但是更強調行動者的部分，就是德興老師在二〇一三年提醒我的。行動者包括譯者、作家、學者還有受眾本身，不能覺得受眾就是乖乖接受宣傳。行動者的自主性（autonomy），就是德興老師最後所提醒的，這些譯者、作家本身，當然一定帶有他們自己的立場，但是不見得在美援文藝結構的體制底下，就是順服的；或者說，他們就應該是抵抗的。我們常常喜歡把它二元對立，要不抵抗，要不就是順從。難道在抵抗與順從之外，沒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嗎？這可能是下一個階段我們在研究文化冷戰的時候，可以進一步發展的部分。同樣都是在這個結構底下，不能這麼貧乏地去想像這些行動者。德興老師這本書是透過了幾個例子去為我們展現行動者的部分。

單德興：謝謝梅香老師的分享，講得很深入。我希望博覽強記的錦忠老師也多講一些。其實這本書裡的每一章寫出來時都請他過目，提供意見。最近錦忠老師也編了一本有關冷戰的書，《冷戰、本土文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內容是有關冷戰時期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雜誌《蕉風》。是不是請錦忠老師也分享在馬來西亞編《蕉風》，閱讀友聯出版品以及其他方面的經驗？

張錦忠：《冷戰、本土文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是我跟黃錦樹、李樹枝合編的書，這本是臺灣版，七月會出馬來西亞版。《蕉風》正好就是梅香講的友聯出版社出版的文藝雜誌。剛剛梅香也提到有四篇學位論文研究《今日世界》，比較之下，很少人研究《蕉風》。對冷戰的關注可能也不是在文學上面，希望有更多人來研究這方面。剛剛梅香講的也對，《今日世界》的讀者不只是在港臺，而是整個東南亞。我少年時候看過《今日世界》，因為便宜，容易看到。不過因為個人興趣，比較會看文學部分。裡頭的科技新知等報導，多以圖片為主。印象深刻的還是德興老師提到的這幾位作家，如余光中、劉紹銘、張愛玲、吳魯芹，特別是劉紹銘評介張愛玲與余光中的《老人與海》中譯，我教翻譯時都會要學生讀，這個學期還給學生當譯評作業的範本。

我還有一點個人看法。今天我們講美援刊物，友聯辦《蕉風》是拿美援的，《蕉風》當然是美援文化刊物，可是《今日世界》是美國人自己辦的，如果叫美援刊物我覺得是滿有趣的。

另外梅香也提到東南亞華文世界。事實上美國對東南亞的宣傳，不只有華文的，也有英文的。梅香也研究過曼谷、新加坡的美新處。其實馬尼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心。比如《水平線》（*Horizon*）詩刊就在那裡印行，印刷得比《今日世界》還漂亮，同樣物美價廉，很多美國流行文化的資訊我都是從那裡獲得，如巴布・狄倫（Bob Dylan）。我小時候就是看這些美援文化長大的，深受「美帝」影響，那也沒辦法。我想當時冷戰文化針對的不只是華人，當然洗華人的腦要多一點，因為有個中共在北方嘛。另外一點就是，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大英帝國。英美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英美關係，應該還是有很多文章可做，我想學社會學的梅香應該會很有興趣。《蕉風》的案例比較複雜，今天先談《今日世界》，改天再來談《蕉風》（七月一、二號在臺北有個「冷戰、馬華文學與文化」線上工作坊）。現在有八十幾位朋友在線上，有人在聊天室提問。

葉大成：感謝單老師和王老師的精彩演講！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那就是根據粗略印象，白先勇在受訪時提到關於「美援」的問題，強調他們在辦《現代文學》時，僅僅接受過美新處的部分紙張支持用於印刷刊物，在內容選擇以及編纂過程中，並沒有受到更多的意識形態干涉。〔美新處處長〕麥加錫（Richard M. McCarthy）也曾促成張愛玲與白先勇、陳若曦等年輕作家的會面。所以是否可以認爲，美新處在臺灣的文化宣傳策略其實是較爲鬆散的，客觀上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使得當時的作家發揮主觀能動性？

單德興：謝謝提問。就我看到的資料，包括白先勇本人的說法，當時的臺北美新處處長麥加錫（就是先前香港美新處處長）是用購買雜誌的方式來支持，例如一期買幾百本，分送到東南亞華人地區，而不是直接給錢，然後要你必須聽命。陳若曦的文章也提到，她到東南亞時竟然也看到《現代文學》，覺得很驚喜。這是我的印象。回想起來，老美的方式很高明，一方面能直接幫到這些年輕作家，給予實質的經濟支援，建立好關係，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們的工作績效，可以跟上級單位報告。

從促成張愛玲與年輕作家見面一事，可看出美新處有心幫助港臺不同世代的作家建立起關係。而張愛玲這次臺灣之行（1961），包括前往花蓮，由王禎和招待，並與他家人見面等等，為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再經過各自的文章傳播，這種文學因緣至今依然為人津津樂道。至於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等人都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作家工作坊，雖是後話，卻是在先前與美新處的來往中播下了種子，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因此，文化交流要把眼光放大，不要急功近利，要求有立竿見影之功，只要有利於彼此，日久必見成效。

Language Center,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致理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單老師提及文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想請教老師，文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比起政治）又是如何？作為「離散文人」，張愛玲和余光中筆下人物如何冷戰，如何政治？

單德興：這個問題牽涉甚廣。就我個人來講，像我和錦忠老師這一代可說是吃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奶水長大的，而新批評主張細讀（close reading），強調文學的自主性，就文學論文學，只看作品本身，不顧其外緣，像歷史、政治等。這種方法對教學和學習很方便，因為細讀是文學的基本功。然而，文學絕不是憑空而來，一定有它的背景，這就涉及歷史與文化，當然也包括政治。我在談翻譯時提倡「雙重脈絡化」，也就是在文本翻譯時，兼顧譯出語（source language）與譯入語（target language）的文化與歷史脈絡。而這本書則試著以歷史化的角度切入，探尋這些作家與作品中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至於作為離散文人，張愛玲與余光中筆下人物如何冷戰？如何政治？就我的理解，「筆下人物」牽涉到人物或角色刻劃，余光中的四大寫作空間——詩、散文、翻譯、評論——與人物或角色刻劃較遠，雖然他也寫過有關人物的文章，或透過特定的persona（人格面貌）來呈現詩作。至於張愛玲小說中有冷戰背景的角色人物，以及他們如何主動或被動地回應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其中的權力關係，這些都值得進一步鑽研。

江足滿：像《今日世界》這種有意義的文學雜誌，可能有什麼單位來協助復刊嗎？

單德興：《今日世界》是雜誌，出版的年代長久，內容五花八門，不是文學期刊，不像《現代文學》可以用復刊的方式重現。其次，它緣起於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化外交政策，等到美蘇對峙情況和緩，首先退場的就是這些基層文宣，把政府預算用在其他地方，這是很現實的。因此，即使像今日世界出版社那麼精彩的美國文學翻譯系列，但要再行出版都還很困難。先前曾有一家臺灣的出版社出過大約十本，後來就絕版了。我曾經詢問美國在臺協會，看有沒有機會重新印行，裡面的人員也很熱心，但沒有下文。因此到現在只看到個別譯者的個別譯作零星再版。那個翻譯團隊是我心目中的「夢幻隊伍」，翻譯的是系列美國經典文學和具有代表性的現當代文學。然而，即使像那種經典譯本的單行本都沒辦法重現江湖，《今日世界》的復刊就更不可能了。若要懷舊，只能到各大圖書館翻閱過刊，或到舊書店尋訪。

陳東榮：剛剛提到已經翻譯出來的美國文學經典，就我所知，坊間的出版社若有出版意願，可以跟美國在臺協會接觸，他們可以把版權釋出。當初美新處付了稿費給譯者，因此版權應屬於美國在臺協會或以前的美新處。我曾經針對這個問題特別請教美國文化總署的負責人。

王梅香：我回應一下葉大成老師。支持《現代文學》的部分，是不是美新處在

臺灣的文化宣傳策略是比較鬆散的？我倒不覺得是鬆散，而是多元。我可以補充幾點。第一，為什麼麥加錫要做這些事？美新處處長的任務是有很多項的，其中之一是必須與在地的文化人接觸，這個是作為美新處處長（Public Affairs Officer，簡稱 PAO）的工作。歷任的臺北美新處處長，沒有像麥加錫這麼積極與在地的文化人接觸，他喜歡文學，在愛荷華就是念美國文學的。有的美新處處長喜愛蒐集佛像，「不務正業」，回去美國就寫了一本研究佛像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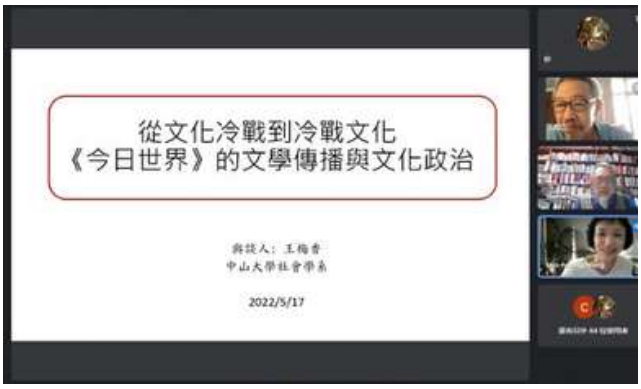
這還有個別美新處處長的議題性。美新處有它基本的業務，還要考慮到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個別的特質。像麥加錫就是喜歡與這些文化人接觸，也真的幫助他們很多。他對於《現代文學》，就是買的那兩期〔第十、十一期〕。我會覺得贊助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我不會覺得那是鬆散，而是不同的合作模式。所以我們今天在看待美新處的運作時應該是要個別來看（case by case），因為有不同的計畫，像《美國詩選》是在臺港學者合作的計畫裡。在不同的計畫裡，美方有它的大原則，也許是反共親美的大原則，可是底下運作的各種方式，包括可以跟 NGO 合作，或是我這個資金主要來自哪裡，有很多不同模組，運作方面是很有彈性的。他們目標很清楚 ，要求的是效率，要達到那個效果，與當地的一些出版業者、當地的文人合作，就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第二個回應就是張愛玲與余光中筆下人物是怎麼去進行冷戰？我猜想你所提的問題可能是，如果是一個文學作品，透過作品裡面形塑這些人物，到底對整個冷戰宣傳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覺得可以考慮的是，像文學作品，透過書籍或雜誌的形式，我覺得那是一個媒介。我們知道美方的宣傳，包括錦忠老師開場白說冷戰要怎麼研究？有人研究音樂，有人研究舞蹈，也有人研究他們來臺灣的各種文化展演，我覺得是表意系統的不一樣。文學就是透過文字，文字裡塑造的情節還有人物形象，比如共產黨的形象。我記得南宮搏的小說裡面，共產黨員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只是透過麥克風出聲。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對抗的對象，可是身處其中的人會覺得一直是被控制的，說不定這才是更好的作品。有很多是透過這種符碼或表意系統去傳達背後那個意識形態，這是文學作品的特殊性。侷限性在於，文學是需要門檻的，必須要能夠閱讀它，才能進入所要傳達的那個世界。相對於一些研究者，研究的是音樂或舞蹈、廣播、電影，媒介的不一樣，能夠接觸的受眾也不一樣。這些媒介都是在冷戰的時代裡，不僅是為自由世界所用，也為另一個世界所用，彼此都在用同樣的媒介。就像我們今天都在用網路，給網紅抖內（donate），是不是也是一種贊助呢？這是媒介的改變。其實可以去思考，今天談的是冷戰時代，也許大家會發現，可能到今天冷戰的邏輯沒有過去，只是媒介改變而已。

張錦忠：謝謝梅香，補充的非常精闢。謝謝大家參加今天的線上新書發表會。

高雄場海報。

高雄場螢幕截圖：（右上起）主講人單德興、與談人王梅香、主持人張錦忠。



與談人王梅香分享畫面。

與談人王梅香分享畫面。

----以上文章轉載自《英美文學學會電子報》2022 年夏季號----